

收稿日期:2024-08-26

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样态、风险及优化路径

宋悦,祁峰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6)

摘要:红色资源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是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的现实需要。作为红色叙事创新发展的动力因子,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有助于调整其传统叙事格局,驱动红色叙事在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模式等方面实现多维智能化发展,但在此过程中潜藏的红色叙事主体失位、内容失真、结构失衡的矛盾性风险同样值得关注。为此,应理性看待人工智能在赋能红色叙事过程中的角色,开拓人工智能与红色叙事融合创新的优化路径,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落地见效。

关键词:红色叙事;人工智能;样态;风险;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3-0019-09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际话语权提升研究”(L24AKS001)。

作者简介:宋悦(2001—),女,山东德州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祁峰(1965—),男,内蒙古赤峰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sxb.1003-6873.2026.03.00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多次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1]。红色叙事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革命精神、革命英雄和革命事迹为叙事核心,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态势下,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不断推进红色叙事主体、内容、模式的创新性发展,翻新其运行样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缺陷、异化风险可能阻滞红色叙事的良性发展。对此,深入剖析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的基本样态,主动研判其潜在风险并提出优化路径,对助力新时代红色叙事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的基本样态

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曾指出,“从叙述性讲,叙事赖以生存的是与它讲述的故事之间的关系;从话语讲,它靠与讲出它来的叙述之间的关系维系生命”^[2]。换言之,对叙事的理解离不开对谁来讲述、讲述什么、怎样讲述的讨论。在人工智能的技术驱动下,红色叙事的主体、内容、模式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呈现出多方共叙、多维共进、多元交互的崭新样态。

(一) 红色叙事主体的多方共叙

1. 由传统人类叙事向人机协作叙事转变

赵毅衡、孙少文从“框架—人格”的角度理解叙述者,认为叙述者既是人格化的叙述主体,也是框架化的叙述结构^[3],既承担着情感表达、意义传递的主体性功能,也通过结构安排、构建文本秩序使故事得以逻辑化呈现。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类人类大脑的思维性和类人存在实体性结合”^[4]的人工智能不再是传统叙事中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素材搜集等能力深度参与到信息采集、文本生成、信息传播等叙事环节中,影响着叙事的方法与效果,在此影响下,人的情感特质、理性思维与智能机器的运行规则、运算能力等相结合,推动叙事活动方式逐渐从传统人类叙事迈向人机协同叙事。

2. 由官方叙述向多方共叙发展

当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起的智能矩阵式传播,即多元交互的推广和传播网络,展现了人工智能在发展红色叙事主体方面的积极效能。人工智能技术重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全流程催生的智媒体使得叙事迈向分布式,使每个个体都有自由参与红色叙事的权利^[5],同时5G、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下沉降低了内容叙述的门槛,进一步普及了分布式叙事样态,技术赋权推动红色叙事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全民媒体阶段,为公众参与红色资源的叙述与传播提供了支撑。在此背景下,人们可以利用智能技术对感兴趣的红色资源进行叙述和传播,红色叙事内容的生成主体不再局限于专业人员、传播主体不再局限于官媒,而是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多渠道广泛传播的态势,驱动红色叙事从单一的官方叙事转向官方主导、多方参与的叙事。

(二) 红色叙事内容的多维共进

作为构建叙事框架与逻辑体系的核心要素,叙事内容指涵盖事件、人物、场景等被讲述故事元素的系统集合^[6]。受制于传统人力采集、媒体报道的叙事方式,星散在全国各地、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红色资源面临着开发不足、研究不力、传播不广的难题。人工智能的应用推进了红色资源的挖掘进度,为红色叙事内容更加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效注入了新动力。

1. 叙事内容广度延展:由疏漏式采集向精细化捕捉发展

受交通不便、人力不足、技术有限等条件限制,依靠人力采集数据的传统方式致使部分偏远地区红色资源面临“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叙事难关。如今,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技术能够通过数据清洗与变换,选择合适的数据分析工具,在对海量数据层层把关的基础上提取、分析和发现相互关联的信息,并实现数据可视化,攻克了红色资源数据收集难关。就红色资源的线上普查工作而言,数据挖掘技术能够从现存红色资源入手,将红色资源挖掘工作与党史研究、方志编纂、退役军人记录等相关工作联结,进一步系统地搜集、识别并查验与红色资源相关的信息,从而达到串点成线、以线带面的资源捕捉效果,扩大红色叙事的内容体量,让更多的红色资源被大众看到。

2. 叙事内容系统构建:由碎片化重组向主题式整合变革

主题式整合是指通过明确各要素的共同特征,选择一个恰当的主题串联起叙事内容,其实质在于寻求事物之间的内外关联性。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红色资源之间内蕴历史延续性,

不同区域的红色资源显现出空间关联性,不同种类的红色资源存在价值互补性。然而,传统的红色叙事方式仅限于讲述目标资源本身,受众难以建立起目标资源与其他红色资源的关联。因此,红色叙事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单一的红色资源本身,而应该以合理的逻辑线索帮助受众建立红色资源的认知框架。人工智能技术依托高性能的数据存储系统和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对碎片化的红色资源信息进行标签化分类、层次化聚类与回归性分析,为系统化的红色叙事提供了便利。当前,已经有博物馆借助数据分析技术整合各地碎片化的红色资源,衍生出红色文旅专线、红色主题云游、穿越革命时空隧道等各类组合产品,为受众从整体上认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种类的红色资源搭建框架。

3. 叙事内容时效增强:由偏重历史性信息向史时并重推进

红色资源属于过去,但更属于当下和未来,其科学内涵既有历史的沉淀,也有基于当下视角的诠释。人们在介绍红色资源时,往往侧重于提供红色资源的生成脉络等历史性信息,这种简单复原过往历史的叙事理念割裂了红色资源与现代社会的关联。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人工智能实现了对人类语言的结构化解析与响应,能够对当下发布的新闻报道、政府公告等文本数据进行分析,并对已有数据进行热度排序,及时发现当前热门话题及深化方向,充分挖掘冷门话题内在价值,实时追踪话题演变,准确预知未来话题的热度,能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价值期望找寻红色资源与现代话语体系的契合点,为增强红色叙事议题设置的时效性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 红色叙事模式的多元交互

交互叙事作为一种前沿性叙事模式,其特点在于叙事者隐身并让位于受众,让受众在多维空间进行自主探索,允许受众通过参与互动来影响叙事内容的发展。随着人机交互技术的进步,红色叙事呈现靶向精准的受众参与式交互结构。

1. 参与式叙事增添受众情境代入感

传统红色叙事借助电影、纪录片、纪实小说等影像及文本媒介直接呈现既定的革命历史,高强度的内容灌输型叙事模式极易让受众对红色叙事内容理解不清、记忆不牢,进而无法产生情感共鸣。当前,人工智能的互动数字叙事依托元宇宙技术搭建出映射现实世界而又超越现实世界的三维虚拟世界,通过智能穿戴设备调动人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受众在虚拟世界中参与各种活动,获得深刻的具身体验,成为故事的“书写者”而非被动的接收者。由华夏文化科技集团自主研发的红色题材电竞游戏《黄洋界保卫战》,正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受众参与式叙事的典型案例。它将红色文化、VR电竞与AI虚拟人物三者结合起来,在反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叙事语境下,运用虚拟模拟技术使受众能够与红军、群众进行交流,同时依托人机交互界面将领取任务、扣动扳机、与敌作战等行动选择权交由受众,使置身拟真情境的受众深刻体会革命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

2. 精准靶向叙事增加受众信息获得感

美国“交互设计之父”艾伦·库伯在互联网发展阶段提出“用户画像”这一概念,指出用户画像是真实用户的虚拟代表,是建立在一系列真实数据之上的目标用户模型^[7]。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用户画像建立在强大的算力、算法、算据基础之上,为实现叙事内容的“精准滴灌”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方面,用户画像实时捕捉散布在网络中的用户信息,对收集到的用户信息进行标签化分类,勾画出典型用户的特征、喜好等多维度信息,实现根据用户诉求进行定制化叙事的目的;

另一方面,通过汇聚并分析用户在叙事过程中对推送内容的反馈及时调整叙事内容、更换叙事方法等,有利于将各类红色资源的叙事作品有的放矢地推送到不同用户的终端,弥补以往口头讲解、书面传播、视频展示等单向漫灌式叙事方式产生的对接缺口,推进红色叙事从“传而非需”向“传而即需”转变。

二、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的风险审视

人工智能在多个维度推进了红色叙事的智能化发展,但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技术有时会“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8]。利弊双行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红色叙事过程中可能引发的风险同样值得关注。

(一) 技术异化离散红色叙事主体的主导性

异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表现为人为创造的他物反而束缚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在考察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时曾指出:“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9]以马克思技术异化思想观照当前表现卓越的人工智能,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可能在主体思维物化、人机关系异化两方面迟滞人的主体性成长。

1. 主体思维物化淡化红色叙事主体公信力

主体思维物化是指主体进行社会活动时所考虑的情感、良知、道德等感性价值被可计量的物质利益所取代,利益最大化成为主体从事社会活动的首要追求。人工智能的深度合成技术异化为深度伪造,正是人的主体思维物化的实例。深度合成技术能够实现叙事内容从无到有的转变,存在着深度创造和深度伪造两种转变结果,相较于深度创造,深度伪造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更为可观的收益。因此,部分叙事主体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借助人工智能的人脸替换、音频伪造、姿态操纵等深度伪造技术,将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事物嫁接成一个全新事物,捏造出看似真实却不具备现实根基的拟真事物,使大量虚假信息混杂在真实信息之中难以辨别真伪,这正逐步蚕食受众对红色叙事主体的信任。

2. 人机关系异化错置红色叙事主客地位

从传统媒介时代记者、作家等作为叙事主体进行话语表达,到互联网时代普通网民借助社交媒体成为叙事主体积极发声,再到人工智能时代虚拟主播等准叙事主体进入大众视野,叙事主体的构成逐渐由自然人、数字人向智能人扩展,尤其是集信息搜集、内容生成、感知交互等多功能为一体的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不知不觉中将叙事的主体角色让渡给人工智能。于是,人类自身的叙事能力不断衰退,而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在反复锻炼中愈加彰显,人类与智能人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地位错置关系,智能人“反客为主”,人类的主体性日益弱化。

(二) 技术异化瓦解红色叙事内容的价值性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是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核心表征之一,即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异化为反对自身的异己力量。在红色叙事过程中,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产出的叙事内容存在数字泛化、同质化、娱乐化的潜在风险,进而瓦解红色叙事内容的人文性、关联性、严肃性,导致红色叙事内容有所贬值。

1. 数字内容泛在化稀释红色叙事内容的人文性

数字内容泛在化是指数据形态贯穿于叙事文本生产的全过程,叙事活动成为一种“以数据要素进行量化、管理和评价的客观对象”^[10]。以大数据为核心支撑要素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推动了数字内容泛在化的加速演进,同时因数字叙事内容便于存储、传输和处理的优点,使得叙事主体在进行内容叙事时倾向于选择数字叙事,以VR数字展演代替实地参观,以屏幕数据呈现代替情感传递,造成原本应该通过富有情感的叙事语境渲染的内容被输出为冷冰冰的数据,原本应依托实地感知的叙事内容被缺乏人类情感与思维能力的智能机器所传达,削弱了叙事内容的人文性表达。

2. 内容同质化削弱红色叙事内容的关联性

人工智能促进了各类红色资源的内容整合,使得红色叙事更加言之有序,但其不具有情感能力和自我意识,整合的顺序和结构通常按照特定指令进行,标准化的运行机制为红色叙事内容的同质化埋下了隐患。此外,人工智能采用个性化推荐算法为受众推送内容时,受众对推送内容的选择偏好会被人工智能识别为正反馈,进而被当作推荐的重点反复向受众推送。这一闭环机制使受众陷于与其兴趣高度相关的内容而“坐井观天”,接收到的只是零散、片面的红色叙事内容,开放性的叙事生态被窄化为单向传播的“回音室”,富有历史连续性的红色叙事内容被切割为不完整的碎片,红色叙事内容的关联性被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藩篱”所限制。

3. 内容娱乐化遮蔽红色叙事内容的严肃性

美国媒介批判学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电视时代造就的肤浅图像使得叙事内容出现了“娱乐至死”的倾向^[11]。时至今日,日趋便捷的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技术增殖理念、受众不断扩张的感性体验需求更是加剧了叙事内容娱乐化的泛滥态势。人工智能在为红色叙事紧跟时事热点赋能的同时,也使红色叙事容易陷入过度娱乐化的陷阱,使受众容易在娱乐化叙事中丧失对内容的理性思考和思辨意识。言辞夸张、博人眼球的叙事标题,忽视精神传递而追求刺激智能体感的所谓红色游戏(实为阵地对抗游戏),等等,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红色叙事应有的政治性与严肃性。

(三) 技术交互化扰乱红色叙事结构的稳定性

人工智能的交互化叙事模式在允许受众通过参与互动感知叙事内容的同时,增加了叙事过程中的不可预测性因素,影响叙事结构的稳定构建。

1. 分散控制影响红色叙事结构的稳定开展

交互式叙事在增强受众体验感和内容沉浸性的同时,存在着因叙事控制权分散而导致叙事内容走向被扰乱、叙事节奏被打乱的风险。一方面,叙事结构的稳定开展依赖于预设的叙事脉络的合理性,而在交互叙事中,参与者的行为选择能够实时改写叙事内容的走向,倘若受众对相关红色知识了解较少,在关键节点的选择可能会触发非主线剧情,叙事内容很可能逐渐偏离核心主题,越来越多的叙事分支可能会干扰叙事结构的稳定展开。另一方面,叙事节奏通过控制时间流动、事件密度,直接影响着叙事结构的逻辑连贯性和主题聚焦度,在交互叙事中,若系统未设计时间限制、主题提示等有效的收敛机制,受众随机探索产生的过慢叙事节奏会进一步扰乱叙事结构中各要素间的动态平衡。

2. 算法偏差阻碍红色叙事结构的有序建构

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能够根据用户的偏好进行个性化的内容推送,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多以用户的点击率为参数来衡量此内容是否为用户所喜爱,考虑的不是内容是否合理,而是内容参数值的高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叙事内容的推送偏差。于是,某些用户群体出于偏听偏信等认知缺陷进行的点赞、转发被算法识别为正向反馈而给予更多推送,会导致红色叙事传播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民族歧视等虚假极端内容因其点击率高得以迅速传播,而公平真实的叙事内容却因点击率低被压制,造成信息量巨大而逻辑链条断裂、细节突出但可能虚假且冲淡核心主题的叙事内容广为流传,大大影响叙事结构的有序建构。

三、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的优化路径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面对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的“危”与“机”,应坚持问题导向,通过防控技术异化、推进技术革新、确保技术向善三方面举措,使人工智能在赋能红色叙事过程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推进红色叙事过程中的主体复位、内容归真、秩序理整。

(一) 防控技术异化,复归人类叙事主体

人工智能到底是向善还是作恶,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类的自主选择。应对技术异化,关键在于塑造并强化人们符合伦理的主体行为观念。

1. 坚持技术向善,矫正叙事理念

当前,商业化、流量化的物化思维一定程度上主宰了技术运行,部分叙事主体以人工智能为噱头营销,一味追求红色资源“火起来”而非“活起来”,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但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12]为此,叙事主体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红色叙事时,应确立技术向善的价值立场,使技术运行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实事求是的叙事态度呈现红色资源中的历史事实、介绍革命英雄,传递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使技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服务而不是成为谋求一己之私利的工具。

2. 祛除技术依赖,激活主体意识

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使得叙事主体在享受技术发展红利的同时产生了技术依赖心态,叙事主体惰性日益滋长,试图将叙事过程中的信息采集、整理、呈现工作全部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与此同时,数字化信息传递方式的变革降低了言语沟通的比重,沉浸于网络生活的人们频繁出现社交障碍问题,人类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愈发衰退。但作为人造物的人工智能存在无法准确理解红色资源中蕴含的深层次情感、难以辨别叙事内容真伪等缺陷,难以承担好叙事主体的角色。红色资源言之有情离不开人类主体性的确立与彰显,基于此,可以通过富有教育意义的方式调动人们在红色叙事中的主动性,同时明确聚焦人本叙事、突出内容感染等要求,逐步实现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祛魅,如举办红色资源演讲比赛等。

(二) 推进技术革新,优化叙事内容

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的关键在于如何以独特新颖的方式呈现既定的红色资源。为此,可

以通过技术革新解决红色叙事过程中出现的数字泛化、同质化、娱乐化等问题,使内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聚焦理念革新,强化叙事内容的实践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卓越效能使其赋能红色叙事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但人类应以现实性思维理性把握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的适宜尺度,把控人工智能在红色叙事过程中的使用比重。对于面临保护困境、不宜让受众近距离接触的红色资源,应选择线上方式加以呈现,可以使其免受物理侵害,如革命先烈的历史照片、手稿遗迹等;其他红色资源,仍应以实体感知方式为主,如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圣地等,使受众在与红色资源的近距离接触中产生情感共鸣。所有红色资源都可以成为红色叙事的内容,但只有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才能,而将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手段或协作伙伴,才能创作出打动受众、久久流传的红色经典作品。

2. 聚能算法扩容,增进叙事内容互联

单一的个性化算法推荐机制是阻断红色叙事信息流传播的重要原因。为此,可以通过算法创新来连接信息孤岛。一方面,聚焦红色叙事,将红色叙事内容进行主题细分,如按照时间划分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陕甘宁地区等,继而根据用户已关注的红色主题,引进反向算法推荐机制,综合考虑叙事内容的多样性进行一定比例的反向主题内容推荐,通过向用户推送“猜你不喜欢”“觉得你不感兴趣”等内容,有效利用负反馈提供关于内容推送的新视角,防止用户沉迷于自身偏好的狭隘环境。另一方面,丰富信息源,在红色叙事过程中利用用户的社交关系网络搭建起红色社交体系,将朋友、家人分享的红色叙事内容纳入推荐系统,如红色书籍读后感、红色景点参观体验等,逐步引导用户关注多样化的红色叙事内容,听取多方意见和包容不同价值。

3. 聚力内容审核,保持叙事内容严肃性

红色资源承载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其严肃性首先体现为历史内容的不可篡改。当前,部分叙事主体为迎合当下受众喜好,获取短期流量,刻意歪曲解读红色资源,弱化了红色叙事的严肃性。对此,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聚力内容审核,对红色叙事的内容采取加密措施,防止别有用心之人恶意篡改红色资源,从而保证传播内容的正确性。同时,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歪曲抹黑红色历史的组织或个人,借助智能筛查提取有效数据,精准发现错误信息,综合分析检索,追查不良信息的源头,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警示人们须秉持敬畏历史、尊崇英雄的叙事态度,从源头遏制不良信息的传播,推动红色叙事向质量看齐而非向流量看齐,保持红色叙事内容的政治严肃性。

(三) 确保技术向善,规制叙事生态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当科技领域存在发展风险时,可以从加强教育、培养人才入手,同时以法律制度强化行为约束,“严慈相济”引导人工智能向上向善。

1. 标注并审视智能叙事作品

当前,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展现出其在叙事领域优于人类的功能和效率,激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信心,甚至这种信心逐步发展为对人工智能的盲目依赖,但这与人工智

能实际发展的成熟度并不匹配。人工智能作为新生事物,难免存在局限性与待完善之处,以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作品的批判性反思,理性审视人工智能的优势与内在缺陷。人工智能极大地促进了AR、VR等技术的发展,创作者利用搭载人工智能的AR、VR等技术丰富红色资源的内容呈现方式时,应该通过张贴明确标识、进行口头告知等方式使受众明白技术构建的虚拟世界只是现实生活的模拟和延伸,无法替代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和情感交流。

2. 高素质人才优化智能叙事

因红色资源内嵌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叙事时,需要有一支既通晓智能技术又具备红色素养的专业人才队伍作为红色智能叙事发展的良性引擎。一要注重跨学科融合与培养。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涉及历史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应以高校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通过构建跨学科知识体系、加大师资建设、开展校企合作等举措,增强人才队伍的理论与实践能力,进而实现技术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二要严格控制红色叙事队伍的质量。人才队伍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好不好”,在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过程中,技术研发理念正确、叙事内容审核把关可靠、技术应用监管到位均需要政治素养过硬的人才队伍,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保证叙事内容的严谨准确。

3. 法律制度等约束智能叙事

要使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取得实效,须以硬性机制勘定人工智能应用的叙事边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前所未有,“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13]。一方面,聚焦针对性与可实施性,提高立法的质量。例如,面对叙事过程中出现的算法偏差导致虚假信息传播等问题,要制定法律明确算法参数、规定惩罚标准,强制要求将历史真实性、民族平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作为红色叙事的必选参数,同时以合理的奖惩机制,对举报属实的用户给予奖励,对不当信息传播者按照浏览量、点击量等指标进行惩罚,有针对性地遏制叙事过程中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须以敏捷治理提高立法的速度^[14],对标人工智能在实际叙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政府为主导,研究公众对人工智能赋能红色叙事的各种意见,为评估现有法律法规适应性、制定或修订相关条款提供重要参考,弥补法律空白,缩短立法周期,使法律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 [1]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22-08-19(1).
- [2] 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9.
- [3] 赵毅衡,孙少文. 论叙述者的功能与形态:“框架”与“人格化”[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4):39-45.
- [4] 唐忠敏. 作为一种新叙事方式的人工智能[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2):78-81.
- [5] 邵芳强,刘安. 智媒体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4):19-22.
- [6] 陈东琼,张洪钰.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体系的建构[J]. 新疆社会科学,2025(2):120-126.
- [7] 李梓萌,吴玉松,苏丹淳,等. 基于CTTI数据的中国智库专家群体画像研究[J]. 图书与情报,2023(5):27-39.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8.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6.
- [10] 王霖凡. 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转向:样态、风险及其优化[J]. 思想教育研究,2024(4):39-46.
- [11] 查特曼. 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中的叙事修辞学[M]. 许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1.
- [12] 拉法格,等.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 马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
- [13] 坚持自立自强 突出应用导向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N]. 人民日报,2025-04-27(1).
- [14] 刘旭东. 变革与回应:人工智能教育立法的四维路径[J]. 比较教育学报,2024(8):1-18.

AI-Empowering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Pattern, Risk, and Optimization Path

SONG Yue , QI Feng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6, China)

Abstract: The resources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is the most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I-empowering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is imperative for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revolutionary genes. As a driving factor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the AI empowerment helps to adjust its traditional narrative pattern, promoting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n the aspects of narrative subjects, content, and modes. However, there are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the absence of narrative subjects, distortion of content,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is proces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rational view of the role of AI in the empowerment of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exploring the optimization paths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AI and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I-empowering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AI; mode; risks; optimization path

[责任编辑:何敏敏]